

开
栏
的
话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红色报刊被称为“人民的喉舌”“抗战的号角”。这些报刊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传播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向群众传递胜利消息,在没有硝烟的舆论战场上直击敌人心脏。它们用文字凝聚抗战力量,以思想构筑精神

防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本版从今日起开设“抗战烽火中的红色报刊”专栏,带领广大读者回望红色报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了解它们如何在艰难环境中创刊发展,如何在斗争中传递党的声音和抗战决心。敬请关注。

《晋察冀日报》——

华北敌后一面战斗的旗帜

■杨润鑫 程宇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并开创了我党我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之初,各项工作百废待兴,特别是如何团结动员群众建设和开拓根据地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提议创办一份报纸,以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记录报道抗日军民英勇作战的故事,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在太行山区阜平城正式创刊,从此开启了我军新闻抗战的征程,并迅速成为华北敌后宣传战线上一面战斗的旗帜。

报社成立之初,由于日寇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经常面临物资奇缺的困境。当时,印刷报纸只能使用粗糙的黄毛边纸;每期仅能用石印机印刷单面两版内容,发行量不超过1500份;报纸的发行工作只能依靠部队或群众转送到读者手中。创刊不到3个月时,报社就遭到敌人对晋察冀中心地区的重点进攻,大部分印刷设备和纸张在敌军的轰炸中被炸毁,报社成员也随部队紧急转移。然而,正是艰难险阻激发了大家的攻坚热情。没有纸张就自己办造纸厂,发行量不足就将石印改为铅印,发行工作困难就在边区各地设置发行干部和交通员……报社成员们与敌人在太行山峻岭之中展开游击斗争,出不了大报就出小报,出不了两版就出一版,凭借编写快、印刷快、发行畅通、转移迅速的优势,将一份份报纸传递到敌后军民手中。此外,为满足根据地军民的文化和思想政治需求,报社专门成立书局,印刷大量书籍、杂志;为更灵活、更机动地学习党中央指示精神、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及更广泛地传播声音,报社设置了电台进行新闻收发。1940年,《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报纸由隔日刊改为日刊。

办报过程中,报社社长邓拓根据游击战理论与敌后办报实际,提出“游击办报”的思想,他要求不论战斗如何频繁,物质条件如何短缺,交通运输如何困难,都应坚持出报。这一思想成为报社抗战时期办报的重要引领,为报社在战火硝烟中坚守舆论阵地提供指引。

随着日寇加紧对抗敌后根据地的进攻,报社面临着更严峻的生存考验。面对敌人的“扫荡”“清乡”“蚕食”,



图①:1945年9月12日刊发的《晋察冀日报》。

图②:1943年反“扫荡”作战前,报社成员进行军事训练。

图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报社出版印刷的部分书籍。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为便于部队转移和报纸出版,报社成员对印刷设备进行轻量化改造。他们用枣木制成可拆卸的轻便印刷机,将笨重铅字锯短三分之二,把铅字架改造为活动式,铸字盒革新为便携式翻式——整套系统仅需八匹骡子即可游击转移,这便是有名的“八匹骡子办报”的故事。一个移动的“游击印刷厂”由此诞生,敌人来袭时,所有设备就迅速拆卸打包搬到骡子背上转移,待安全后又卸下设备组装印刷。为了更好进行游击作战,报社还组建了武装自卫队,没有敌情时就编写稿、出版报纸,一旦与敌人交战就拿起枪奋勇战斗,保护印刷设备安全撤离。

1941年8月,日寇逼近报社驻地平山县滚龙沟。由于与司令部失去联系,报社成员化整为零,分散到大山中与敌周旋,在游击间隙坚持出报。为防止敌人发现踪迹,成员将印刷设备埋在滚龙沟深处的桦子尖,敌情解除后立即挖出赶印报纸。在敌人“扫荡”的25天里,成员勇敢机智地“七进七出桦子尖”,共出版报纸23期。这些报纸,对于稳定根据地的民心军心、鼓舞军民抗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1943年,日寇对根据地的摧残更加疯狂。为在离开马兰村之前再出一期报纸,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报社全体成员齐心协力,连夜赶制报纸,直到印刷出800份报纸后才立即转移。在北营村,成员被敌人发现后,转移到战场外

线的玫瑰坨,12天坚持出版12期报纸;在五台、盂县交界的“无人区”里,成员顶着凛冽刺骨的冷风前行,转战19天最终到达安全地区继续出报……在那段艰苦岁月里,报社成员就这样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深入敌后战场,在太行群山之中进行新闻游击战,将一份份报纸化作炮弹,与敌人开展宣传舆论斗争,把前线捷报送到敌后军民手中,坚定群众抗战必胜的决心。

在与敌人斗争的同时,报社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报社成员齐心协力下,晋察冀日报社逐渐成为一家包括报社、通讯社、出版社、书店和广播电台的综合性新闻出版机构,从太行山区的小山村走出华北,走向全国。《晋察冀日报》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国内国际新闻,融合消息、通讯、社论、漫画、顺口溜、歌曲、诗歌等多种载体。报刊记录了前线军民英勇杀敌、根据地民兵支前、民主选举、减租减息、群众生产等场景,报道了爆炸大王李勇、狼牙山五壮士、回民英雄马本斋、放牛娃王二小、白洋淀雁翎队的英雄事迹,刊发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放牛郎》等著名歌曲,并出版中国第一

部《毛泽东选集》。此外,为动摇敌人战斗意识,《晋察冀日报》还开设“日军士兵的觉醒”专栏,通过刊登日军士兵的反战言论和信件,报道日本国内灾害和经济困境,直击敌军心理防线。凭借通俗幽默的文风、鲜活生动的表达、贴近群众的素材,《晋察冀日报》不仅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政策、掌握战况的重要信息来源,也化作鼓舞抗战士气、凝聚抗战信念的精神纽带。

1948年6月14日,随着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与全国大反攻的战略推进,出报2800余期的《晋察冀日报》完成了历史使命,发表终刊启事。作为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之一,《晋察冀日报》坚持“游击办报”的思想,时刻斗争于敌后抗战一线,用一篇篇饱蘸热血的报道,积极传播党的政策方针,热情宣传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真实记录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百态,有力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为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而在艰难办报过程中形成的红色办报精神也被永久流传,激励着一代代新闻人继续以笔为枪、砥砺前行。



抗战烽火中的红色报刊



车驰轂错马嘶鸣

——中国古代战车(下篇)

■曹波 孟圣波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车战的巅峰阶段,战车战术由此得到显著发展。《六韬》专门设有“车战”章节,详细分析了战车、骑兵和步兵的作战效能,将战车喻为“军之羽翼”,认为以战车列阵具有最强战斗力。在实际作战中,战车部队要避免开死地、绝地、劳地等10种不利地形,并把握敌军阵型不稳、进退犹豫等8个关键战机。鞞之战是春秋时期晋齐争霸的关键战役,战车在此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589年,齐国出兵攻打鲁国龙邑并击溃前来支援的卫国军队后,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援。晋景公遣大夫卻克率800乘兵力讨伐齐国,双方在鞞地展开决战。此战中,齐顷公犯下致命失误——未给战马披甲便贸然冲锋,导致战马在晋军弓箭射击下损失惨重,车战近身格斗时也陷入劣势。而晋军方面,主帅卻克中箭后血流至鞋仍坚持击鼓指挥;车御解张将穿透手肘的箭杆折断后继续驾驭战车;车右郑兵缓则反复下车推行陷入泥沼的战车。正是这种战车乘员间生死与共的默契配合,晋军庞大的战车集群冲锋,最终成功突破齐军防线,创造了

春秋车战的经典战例。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春秋战国之交出现拥有大量步兵的新型军队。铁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能够在宽大正面上有效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战车由于车体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受地形和道路条件限制,逐渐被步兵、骑兵取代。但这一演变过程极其缓慢,直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仍保有数量可观的战车,大规模车战时有发生。秦朝战车的使用情况可通过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兵得到印证,虽然木质车体已朽毁,但从陶制战马和甲士分布可以看出每乘战车仍保持前驾四马、甲士三人的传统形制。秦汉时期,步兵和骑兵已能有效攻击车阵,战车不再担负主要作战任务。

汉初战争中战车仍发挥一定作用,但到汉武帝时期,为应对与匈奴的持续战争,汉军大力发展骑兵部队,战车最终退出主战装备序列。此后出现的各种轮式车辆如攻城、守城作战用的临冲吕公车、撞车,以及宋朝巷战车、虎车、象车等,都只是作战辅助装备,不再是主力战车。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先秦时期车战场面。资料图片

挥用车,不直接参与冲锋;轻车为机动攻击型战车,用于快速突击或迂回包抄;闾车为警戒与后备补充车,填补战场空缺或应对突袭;革车为防御性战车,可连接临时屏障阻挡敌军;广车为攻守兼备的重型战车,用于正面突破或固守防线。在实战运用中,每辆战车都配备7名步兵协同作战。

随着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一国拥有的战车数量,逐渐成为衡量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乘是基本作战单位,一乘由一辆战车及其战车兵和附属步兵共同构成。随着战场环境日趋复杂,战车的分工逐渐细化、种类增多。西周出现的5类战车经过装配各种武器,被赋名为用于作战指挥的“武卫大扶胥车”、用以冲击敌阵的“武翼大櫓矛戟扶胥车”、执行迂回突击的“武翼小櫓扶胥车”“矛戟扶胥轻车”等。



史说新语

1939年,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后,深入豫南、鄂中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建立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多个以弱胜强的战例,朱堂店战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这场战斗中,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以劣势装备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并大获全胜,提升了新四军在豫鄂边区的影响力,成为新四军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挺进信罗,突袭日军车队

1939年6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湖北京山县养马畈召开会议。会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整编与扩大鄂中抗日武装的指示。会议决定根据上级指示统一整编豫南、鄂中的抗日武装,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队。其中心任务是: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以模范的纪律和积极的行动,建立新四军的威望,争取更多的合作者,扩大与巩固抗日武装力量,开展豫鄂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7月中旬,在信阳南王岗完成整编的第2团队,根据支队命令,主力部队向信阳、罗山敌后挺进,一面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开辟信罗边敌后抗日根据地。

8月上旬,第2团队到达柳林北的王家店车站,其先头部队发现日军运兵车。团长王海山当机立断,率领第2团队对敌发起突袭。日军损失惨重,匆忙向信阳逃窜。不久,日军派骑兵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被第2团队击退。随后,第2团队经杜家畈到达罗山县朱堂店一带,并在此驻扎。

朱堂店位于大别山北麓,西邻平汉铁路,是信阳与罗山交界处的一个重要集镇和交通要塞。部队进驻后,在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派遣侦察人员密切监视信阳日军的动向。侦察后发现,日军不仅派兵在朱堂店以北的左店活动,还派遣侦察小组潜入土门和芦家松林,窥探我军驻防及地形,企图伺机偷袭。

研判形势,做好周密准备

面对这一情况,加之考虑到日军在运兵车遭袭后必定报复,第2团队立即召开团部紧急会议。会议研判认为:敌军必然会进犯朱堂店,为争取群众支持、扩大我军影响,此战势在必行且必须全力取胜。针对日军可能采取的行动,第2团队确立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第2大队及第3大队1个中队坚守朱堂店及东北阵地;第3大队另1个中队配置在朱堂店东北日军进攻的侧翼,采取节节抵抗、伺机出击的战术诱敌深入;第1大队依托西南陈家祠堂的高山地形寻机歼敌;同时,第3大队2个中队负责朱堂店以东的警戒任务。

会后,各大队立即展开战前动员工作,使全体指战员深刻认识到此战不仅关系到党和新四军的声誉威望,更直接影响部队在罗山地区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巩固及后续南下战略的实施。在充分分析敌情我情后,大家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各级指战员纷纷向上级递交请战书,表达必胜决心。整个部队迅速进入紧张有序的战备状态:大队、中队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研究火力配置和战术打法;战士们积极检修武器装备,有的擦拭枪支、打磨刺刀,有的捆扎手榴弹、清点弹药,还有的缝补装备、赶制新草鞋;炊事班加班加点赶制干粮,确保每位战士都能携带充足补给。经过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各项准备工作很快就绪,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诱敌深入,巧用战术歼敌

8月13日深夜,狂风大雨,日军集结了信阳、东双河、李家寨、柳林等多个据点的400余人,趁着恶劣天气悄然行动。他们身披雨衣,携带精良武器和通信设备,并用几十匹战马驮载着重炮和机枪等装备,从王家店出发,经杜家畈向朱堂店进发。

14日拂晓,获知日军动向的第2团队立即按计划进入战斗位置。第3大队1个中队率先与日军交火,为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他们边打边撤。日军果然中计,紧追不舍。当日军被诱入预定包围圈后,第1大队迅速迂回至正面发起反攻,第2大队向日军左翼发起猛攻,团队所属警卫队和手枪队从右翼发起冲锋,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在三面围攻下,日军阵脚大乱,伤亡惨重、仓皇逃窜。其中,第2团队乘胜追击,将日军逼至朱堂店以北的枫树坡。

枫树坡地处群山环抱的低洼地带,地形复杂,林木茂密。日军原想凭借此处地形组织反击,却不知已落入我军的“口袋阵”。当日军全部进入枫树坡后,埋伏在此的我军2个中队突然开火,打得日军措手不及。随后,日军组织多次反扑企图突围,但均被击退。然而,由于我军装备简陋,缺乏重武器和充足弹药,几次进攻都被日军火力压制,未能给予日军致命打击,战斗陷入僵持局面。

为减少伤亡、节省弹药,团长王海山下令停止进攻,转而利用日军畏惧夜战的弱点准备组织夜袭。日军为避免夜战,竟施放毒气掩护突围。王海山临危不乱,一面组织官兵做好防护措施,一面继续指挥作战。

激战至天黑,王海山采取“网开一面”战术,故意在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以诱敌突围逃跑,并暗中安排第2大队在芦家松林设伏。急于逃命的日军果然中计,慌乱中从预设缺口突围,第1、第3大队立即尾随追击。同时,埋伏已久的第2大队突然杀出,与追击部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在密集火力打击下,日军残兵往信阳方向逃窜。此战,新四军共毙伤日军8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子弹数万发、战马4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朱堂店战斗,不仅重创了日军嚣张气焰,更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双重胜利。战后,当地群众盛赞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自发组织慰问,国民党第5战区第4游击纵队也派代表联络表达合作抗日意愿。这场胜利还震慑了当地的伪军,促成伪军1个中队携械投诚。

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朱堂店战斗无名烈士墓。资料照片

新四军朱堂店战斗

■张磊 刘礼鹏